

中央民族大学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WEEKLY



主管单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编辑出版：中央民族大学校报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11-0811/(G)

2021年10月22日

第455期
(总1658期·周1233期)



中央民族大学
微信公众平台

校训

美美与共 知行合一

校庆专刊



中央民族大学
七十周年校庆
70th ANNIVERSARY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隆重庆祝建校70周年

本报(记者王卫平)历史镌刻辉煌,岁月铭记荣光。10月16日上午,庆祝中央民族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在丰台校区体育场隆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和关心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各界人士欢聚一堂,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共襄盛会。

清晨,迎来七十华诞的中央民族大学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焕发出勃勃生机。会场内,红旗飘扬,绿草茵茵,主席台两侧展开的卷轴上,印刻着“我从延安来永远跟党走”的校庆主题。暖场音乐点燃全场激情,来宾和校友或自拍或互拍,与校庆logo拍照合影,与昔日老师同学合影,滚动播放的校庆视频《我的足迹》带领大家共同回顾学校70年光辉历程。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陈小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侍俊,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边巴扎西,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夏林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刘新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罗梅,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西藏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巴桑,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图道多吉,吴仕民,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瑞清,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德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区长初军威,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校长郭广生等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委市政府、地方政府领导,50余所兄弟高校领导,学校老领导,各地校友代表,师生员工代表出席大会,共同庆祝中央民族大学70岁生日。

上午9时许,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郭广生宣布庆祝大会开始。

陈小江在讲话中代表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向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及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深刻,既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也为民族院校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陈小江指出,中央民族大学是从延

安走来的,是我们党为解决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高级专门人才而创办的高等学府。70年来,学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累计培养了20余万名毕业生,为民族地区乃至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70年来,学校深入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持续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投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贡献了智慧和力量。70年来,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先后成为全国重点大学、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入选“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特别是近十年,学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开放办学、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陈小江指出,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中央民族大学的建设发展。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学校视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全体师生回信,极大鼓舞了中央民族大学广大师生建设一流大学的信心和决心。中央民族大学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重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建设和发展水平,努力在服务党和国家战略、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列。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民族理论政策研究的重要基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要坚持立德树人,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底色,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用中华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新人。要坚持服务大局,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助力各民族在共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改革创新,大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加快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努力把学校建成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学。

陈小江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学校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广大青年学生要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出壮丽的青春之歌,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中焕发出绚丽的青春光彩。

夏林茂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民族大学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中央民族大学有着光荣革命传统、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办学特色。70年来,学校始终传承红色基因,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始终服务首都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站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希望中央民族大学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下当标杆,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创一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求突破,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上作表率。他表示,北京市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中央民族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他祝愿学校在建设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在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更加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

张京泽以“扎根中国大地,奋进时代征程”为题致辞。他指出,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民族高等教育的成功实践。今年“七一”前夕,“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入选党的百年大事记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充分彰显了中央民族大学在党的百年征程中的独特地位与特殊贡献。

“七十年薪火相传,七十年辉煌相继。”张京泽强调,中央民族大学的奋进之路,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同行,是一代代民族大人勇担时代使命的奋斗之路,更是一条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符合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需要的创新发展之路。70年来,各民族师生听从党的号召,守望相助、携手同行,书写了恢弘豪迈的历史篇章。中央民族大学70年的历史,是一部沐浴党的民族政策光辉、坚定不移跟党走接续开拓史,是一部各族师生交融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团结进步史,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倾情奉献祖国的不懈奋斗史,是一部紧扣时代脉



马丹妮 摄

搏、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创新史。

“七十年筚路蓝缕,七十年砥砺前行。”张京泽表示,中央民族大学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离不开上级部门和兄弟院校、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也离不开学校历届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师生的团结奋斗和辛勤耕耘。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民族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新时代民族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新任务,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毫不动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进新时代,迈出新征程,为服务国家战略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张京泽代表学校各族师生员工,向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全体师生日海内外校友致以美好祝福,向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及各界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全校各族师生要坚定自强自信,创一流大学,要增强教育自觉,育一流人才,要强化使命担当,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的宣传者、践行者、引领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再创新的辉煌!

靳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内兄弟高校,对中央民族大学建校70周年表示祝贺。她表示,中央民族大学与中国

人民大学都从延安走来,比邻而居、情深意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共同的家国情怀。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两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层次、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人大“实事求是”与民大“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校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双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真实写照和生动缩影。靳诺说,中央民族大学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民族高等教育的先河,谱写了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动篇章,成为国家民族高等教育“模范生”“示范者”“排头兵”,希望两校与各界兄弟院校一起携手奋斗、共同进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国外高校代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校长约翰·欧哈勒通过视频,向中央民族大学70周年庆典致以热烈问候,深情回顾了以自己以及科克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渊源。他表示,科克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合作促进了文化交流,分享了人才和教育经验,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合作,成为中爱之间教育和文化的桥梁。

校友代表、1988级数学专业本科生、同景集团董事长吴红代表广大校友祝福母校“生日快乐”。他回顾了自己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求学经历,向母校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祝愿母校在教育

育质量、研究水平等方面更上一层楼,为国家培养更多杰出人才。

教师代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小花教授,从本科到博士都在中央民族大学求学,后又留校工作,与学校有33年的交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民大人,她说,“红色基因滋养过的一代又一代民大教师,爱岗敬业,热爱各族群众,关爱各族学生,化育了学校团结、感恩的人文情怀。”“山积而高,泽润而长”,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更加信心满怀。

“你把红色血脉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你把红色基因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你红色的基因传承着真理的光芒,你红色的初心刻入了团结的使命……”学生代表铿锵有力的献词道出了万千学子的心声,喊出了满园桃李的铮铮誓言,“各民族学子坚定投身强国伟业,青春因自信而闪亮,人生因信仰而坚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七秩春秋砥砺奋进,廿万桃李薪火相传。在中央民族大学建校70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奔腾着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因党而生、为党而立、向党而兴,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成长,一代代民大人矢志不渝、自强不息,秉承“美美与共、知行合一”校训精神,努力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责任与重大使命中书写不负时代的华美乐章。

陈小江看望中央民大师生并同师生代表座谈

10月16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陈小江在中央民族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深入学校调研并出席相关活动,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及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在学校丰台新校区,陈小江参观学校办学成就展,实地查看智慧中心、图书馆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基本建设等方面情况。在海淀校区,陈小江亲切看望各族师生,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座谈会。在听取学校汇报和4名师生代表发言后,陈小江指出,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国家民委直属高校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陈小江指出,要充分认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要从政治上、战略上把握这次会议的定位,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陈小江强调,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历史脉络、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重点任务、工作主线、制度保障和实现方式等。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统筹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点任务,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陈小江要求,中央民族大学要充分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作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学校立德树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方面当好排头兵。要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教育内容体系和课程体系,以中华文化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根,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边巴扎西陪同调研座谈,国家民委专职委员、校党委书记张京泽陪同调研座谈并作汇报。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 赓续红色基因 奋进世界一流

——中央民族大学70年办学成就巡礼



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南校门。

这是一所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学校！这是一所成长于首都北京的学校！这是一所沐浴于党中央关怀的学校！这是一所肩负着党和国家特殊使命和光荣任务的学校！

2021年，“中央民族学院开学”被光荣载入《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入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因党而生，为党而立，向党而兴”，是这所交织着光荣与梦想的学校的鲜明写照。

创办民族院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从延安民族学院到复办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再到中央民族大学，经过70年的发展建设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学校已经成为践行政治立校的重要高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民族理论政策研究的重要基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

初心如磐：沧桑更迭薪火相传

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乌兰夫同志任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建校初期至1966年，毛泽东同志先后14次在中南海接见学



中央民族学院设立

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一处分院，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基地。目前，全国共设立中央部委直属民族高校6所和地方公办民族院校15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

2019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作为重要成就，入选“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也是唯一被单独展示的高校。



2019年10月1日，中央民族大学师生献礼新中国70周年华诞。

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全国高校层面率先开展校内巡察，相关工作多次被中央主题教育官方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以及中央主流媒体关注报道。

2017年，学校第八次党代会确定了扎根中国大地“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绘就了“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管理强校、开放办校”五大战略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建设蓝图，为学校发展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学校坚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化思政课程改革，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完善思政工作保障体系，形成“5+1+N”（5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识教育系列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思政教育格局，形成了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思政教育体系。

近年来，学校先后获批中央统战部等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基地”等重点平台，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第十二届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等学校”提名奖等荣誉称号，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4个、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双带头人”工作室1个、1人被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立德树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各民族优秀人才

7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累计为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20万余名各民族优秀毕业生。他们当中不乏本民族的第一个学士、第一个硕士和第一个博士，既有学术名家、党政干部，也有业界精英、文艺名家。他们扎根边疆、无私奉献，已成为党和国家特别是民族地区各行各业的骨干，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固、服务脱贫攻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形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的研究型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复合型人才、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优秀艺术人才等四类一流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了“孝通班”“应用专业+民族语”等19个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专业实验班，探索构建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生源质量持续提升，就业质量逐年提高，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成绩连续在“双一流”高校中位居前列。“十三五”时期，学校荣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1项，荣获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全国奖项18个，省部级奖项202个，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和国际级奖项340项、省部级奖项968项。

一代代民大人将深厚的爱国情、高远的强国志，转化为笃定的报国行。学校在历次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中勇挑重担，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出色完成了一次次光荣任务，充分展示了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和谐共融局面。多名学生在国庆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活动总结会上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一批优秀校友奋力拼搏在脱贫攻坚一线，张小娟校友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周异决等14位校友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李万岳、甘丹平措2位校友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荣誉称号。

传道授业：争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大先生

7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始终坚持以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师魂，着力培育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队伍。

建校之初，学校大师云集，汇聚了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翁独健、吴泽霖、冯家昇、杨成志、林耀华、傅乐焕、于道泉、闻宥、马学良、王翰卿等一批享有盛誉的“大先生”。他们学识渊博、师者

仁心、济世育人，奠定了学校深厚的学术基础，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进入新时期，学校涌现了一批以戴庆厦、牟钟鉴、胡振华、杨圣敏、班班多杰、黄泰岩、麻国庆、斯琴朝克图、杨宗丽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和教学名师。

学校全面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人才当作“强校之魂、发展之根”，着力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起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责任明确的人才约束机制、科学合理的选才育才机制，确立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形成了以领军人才、杰出人才、优秀人才、优秀青年人才为骨干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涌现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十余个省部级以上创新团队。

创新驱动：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7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始终坚持高等教育“四个服务”，坚持“四个面向”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承担了大批国家级重大项目，产出了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充分展现了“民大智慧”，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咨政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社会形态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从关于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建议到对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研究，从西沙南沙考古新发现到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科学研究等，学校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受到了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学校重点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强国、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倡议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的使命与责任，围绕民族宗教与国家安全、跨境民族与边疆稳定、中国语言国情、共同富裕、兴边富民与脱贫攻坚、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与利用等领域开展研究，出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语言国情调查系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地区贫困百年奋斗》等著作。主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乌兹别克文版审定翻译工作，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民族文字翻译审定工作。“十三五”时期，学校新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21个；获国家级科研项目403项，较“十二五”期间增加86%；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00项，其中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6项；一批资政报告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苏发祥等多名学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美美与共：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7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始终坚持协同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阐释、创新发展、传播交流，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的《奔騰》获“第十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歌曲奖”的《吉祥三宝》、创世界单曲发行枚数之多的《中华民族团结》纪念邮票等一批优秀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近年来，学校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大力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设内蒙古乌兰牧骑音乐创作、舞蹈编导高级研修班，组织“争做乌兰牧骑文艺轻骑兵”主题活动，大力弘扬新时代乌兰牧骑精神，出版《22种民族古文字》《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等珍稀典籍，荣膺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和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推出《石榴花开》《红河谷（序）》《生命之光》《情深谊长》等大批既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华，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负责北京地铁6号线西延段和7号线欢乐谷站、广渠门站内公共艺术作品



中央民族大学2021年荣获“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等学校”提名奖。



中央民族大学坚持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图为“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8”在校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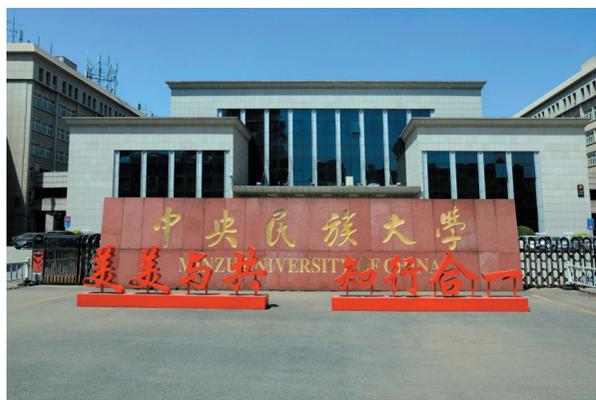
设计：被誉为“美得可以拍婚纱照的地铁站”

“最受百姓喜爱的艺术品”，荣获马塞尔行业“金魔方”奖；设计联合国际邮发行政农历年庚子鼠年纪念邮票，积极传播中国生肖文化；荣获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先进集体称号；蒙曼等一批学者通过《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品牌栏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开放包容：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70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始终充分发挥独特窗口作用，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积极拓展与世界知名大学、国际顶尖大学和重要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探索构建全球教育合作布局。

学校成立伊始，聘请多位从事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苏联专家来校任教。20世纪60年代，学校成为中国最早接收外国留学生和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8所高校之一。近年来，学校加快推进“开放办校”战略，以“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为合作重点，不断提高国际合作交流水平。学校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214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等30所



中央民族大学海淀校区校门校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丹桂飘香中,我们迎来民大七十岁生日。七十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不忘初心来路;七十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牢记使命担当。你有民大,所以幸福充实;民大有你,所以生生不息。相互陪伴中,民大与你共同成长。生命中与民大交错的部分,成为我们共同的美丽记忆。

筚路蓝缕 艰辛创业

——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老学员访谈录

黄思正 吴秉福 隆和德 龙俊峰

他们是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的老学员,1950年9月后陆续来北京报到。

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和成立初期,分成六七处。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国子监54号,也叫筹备部。那个院子比较大,后来那儿新修了一个礼堂。礼堂后面有总务部,有饭堂,也有图书馆,那是初建。总务部当时有供给科、管理科和办公室。供给科分两部分,一部分管全校文具用品的供给;另一部分管办公用品的供给;另外就是会计室。总务部部长是刘冠英,他是办公室主任兼总务处处长,副处长是何建勋,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何孟雄的哥哥。总务部后面是人事处,处长是胡嘉宾,那也是老革命,还有吴凡、王克、邓真、周玉山这些。我们筹备部旁边还有一个小医务室,那时叫“特54号”。不久,医务室来了一位关全章大夫。医务室斜对门有一个生产科,负责人是甘宁,他是陈绍禹(王明)的兄弟,也是老干部,负责生产合作社。东单七条胡同,那是院部,刘春住在那里,设有办公室,刘冠英是办公室主任。柴棒胡同,建委会设在那里。下洼子,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在那儿住了几个月时间。雍和宫后来也临时住了一些学生。还有一处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1951年4月藏语班就办在那里。

我们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共有47名学员。湘西的来了9个,有苗族、土家族,但一开始没有报成土家族的。湘西来的为什么多呢?那是跟朱早观将军有关系的。朱早观是湖南凤凰苗族,解放后他回到凤凰,带着一批中学生上部队,一次去了二三十个人。消息传开来,我们也想跟着走,但消息知道得太晚了,到了县城没赶上。那时县里头正办一个“苗族干部训练班”,我们就打算参加这个班。去了以后,由于当时经济上比较困难,粮食也少等问题,县长就说这个不行了,已经开课好长时间了,没有机会了。北京有一个中央民族学院,也有军政干部训练班,把我们介绍到那儿去吧。就这样,县长开了介绍信,弄了一点盘缠,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上了中学以后,离家顶多也就三十里,再远就没有出去过。大山里头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出过门。我们那时候用我们那种普通话跟人家搭话,人家都听不懂,“土”到那种程度。我们从凤凰到麻阳、常德,坐的是汽车;从常德乘火车,入洞庭湖,到武汉;从武汉转火车到北京。一路闹了不少笑话。

我们这个班,除了湘西籍学员以外,回族同学也比较多,主要是西北来的。分成两个小组,辅导员是白静媛、王玉华两位老师。王增田老师管我们学习。张志平老师是班主任。我们报到以后,生活各方面享受

了国家的特殊照顾政策。当时学校的伙食分小灶、中灶、大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像处级干部有小灶。我们学员给中灶待遇,那是吃得相当好的,反正一天好几个菜,伙食不错,但一开始吃不惯。被服学校统一发放,冬天发棉衣一套,夏天发单衣一套。就是那种白五幅布,那是最好的。而且还带着中央民族学院的记号,用布做的。每个月学校还给每位学员三块钱零花钱,让大家买牙膏牙刷这类东西。我们几个人关系好,有时候想买一支钢笔,就组成临时互助会,这个月你买,下个月我买。

刚来的时候,我们带来的被褥比较薄,衣服也薄,天一冷,又干燥,感冒就比较多。有一次刘春院长亲自查铺,发现我们班有学员睡合一铺子。当他知道是因为被子薄合在一起取暖的时候,很着急。第二天,就从中央工委调来被褥。当时咱们学校没有别的车子,就用十轮大卡车,从民委把当床用的铺板和被褥什么的都拉过来,说被子薄的,一人一份。说真的,院领导对我们少数民族学生相当关心。

当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社会主义理论,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具体的书名都记不清楚了。“五大领袖”之一的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在全国团代会上的讲话,也是重要学习材料。然后主要就是讨论。讲课的老师里记得有一位张志平老师,当时她是教务处的,也是老干部,她丈夫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朱早观将军。除了学习,我们还有军训,教官叫杨世坤,从中南海调来的,教我们立正、稍息、左右看齐、齐步走、走正步等基本动作。

那时候的课余时间比较单调。我们到北京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中南海里头的怀仁堂。因为那时候学校没有电影院,外边我们也去不了,也没有什么文艺活动。中央工委晚系安排以后,说带我们看电影去。晚上坐着大卡车去,完全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反正最后就到了怀仁堂。看的是反映解放战争激烈战斗场面的电影,名称忘了。谁敢想我们人生第一次看电影竟然是在怀仁堂啊!

军政干训班的学习总共也就是半年时间,9月份开学,学员们陆续来报到。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就过年的时候休息了几天,基本上都在学习。1951年4月底,因为当时太缺干部了,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这样我们就结束训练、留校工作了。我们班留了将近一半,主要在后勤、总务和建委会,建委会比较集中,因为西郊校舍建设需要人。当时建委会主任是高锡堂,副主任是薛明斋,潘淑奇(音)是秘书科,陈明是工程科,白振辉(音)是材料科。这几个

都是“三八”(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1951年4月底,我们建委会的人就陆续来到西郊。那时候这些地方全是老百姓的地,我们春天来的时候,人家种的麦子都长得老高了,地里头还有狐狸之类的动物。现在国家图书馆那里以前是一个高坡,高坡的树林在解放前还是土匪抢人的地方,荒凉到这种程度。从西直门开一辆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去,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才有一趟。那时候汽车烧什么啊?烧木头!汽油什么的都没有,车子也没什么人坐。现在的法华寺这里有个小村子,我们先把法华寺改造了,就是把四大金刚搬出去,神像也搬出去,腾出配殿,我们就住在配殿里。后来住不下了,又在现在的十二号楼对面租了几间民房。

当初学校规划的范围,南面到白石桥,西面到万寿寺。万寿寺那里有一个广源闸,我们在那里还有一栋房子,那就是当初跟农民买下来的。工勤人员有四五十户就住在那儿。建设规划相当宏伟,现在的社会主义学院这里,当初规划做跑马场。设计有梁思成这些大专家参与,大礼堂就是梁思成的杰作。家属院的楼是设计是北京设计院的专家张博,房子是按清华的样子设计的。

1951年春天,第一批投入建设的是大礼堂、3号楼、4号楼、15号楼、16号楼,要求当年建当年就要完工。唯一一个施工的国营单位是从上海调过来的。这几栋楼全是磨砖对缝,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买的红砖,北京不生产,都是从天津运来的。运到这里来以后,觉得跟民族古典建筑颜色不配,所以就拿灰砖砍,砍完以后手工磨,磨完以后一块一块添上去,把红色盖住。1952年,施工最紧张,一边盖2号楼、17号楼,一边开始平整校园、修马路,要迎接师生入校。修马路的队伍是辽宁来的。那时候北京没有掌握铺油技术的施工队,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所以是从辽宁调了队伍来的。由于工期进展顺利,学校1951年就开始长期招生了,到1952年,学校已有了一定规模,秋天就投入使用了。1953年盖18号楼,就是艺术系这栋带小礼堂的楼。1954年盖6号楼,就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在的这栋,以及12号楼,那时也叫干训楼。1955年盖1号楼。1959年盖老图书馆,就是今天的民族博物馆。为什么1号楼盖成这个样子?因为1955年以后,反大屋顶,认为铺张浪费,所以大屋顶就取消了。1号楼西边还剩下两个“女儿墙”,结构跟6号楼类似,也全被砍掉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盖房子用的那些木头,几乎都来自内蒙,乌兰夫院长了解到学校建设的需要,说你们到内蒙拉去吧,所以就往内蒙拉了木料。

从1953年到1954年,校园建设绿化,绿化设计图是委托林业大学园艺系主任汪菊渊主持设计,具体操作是他的一个助手叫梁永斌。汪菊渊教授介绍他的设计指导思想时说:民族学院是多民族的院校,各个地方的人都有,所以设计绿化的树种比较多,布局上也不是整齐划一,而是自然状态的。我们学校的绿化还有一个特点,常青树比较多。当时除了清华、北大那些老校园,后建的学校里面,常青树比较多的要数咱们中央民族学院。

1959年以后,由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好,校舍建设基本停滞。因为建设跟不上,原来规划的校园也就收缩了。

注:黄思正(1933年—2018年)土家族,湖南凤凰人;吴秉福(1930年—)苗族,湖南吉首人;隆和德(1931年—)苗族,湖南吉首人;龙俊峰(1930年—)苗族,湖南凤凰人。他们是1950年9月开班的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1951年4月同时留校工作。

本版图文由民族博物馆口述史研究中心提供



▲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训练班辅导员和学员在雍和宫大殿(建校初期教室旧址)前合影。第一排左起:白静媛、王玉华、吴天忠、马聘;第二排左起:吴秉福、隆和德、吴秀全、龙俊峰、姬达;第三排:黄思正。

回忆藏语专业班的教学与实习

罗秉芬

1949年,我高中毕业,先是考上了南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1949年正值国家教育体系调整,南宁国立师范学院和广西大学的一些系也进行了调整,我就从南宁到桂林,去广西大学中文系继续学习。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北大东语系到全国各地招生,当时准备支援东南亚,要招一批学生到北京大学学习东方语言,我就被招到北大东语系,那是1951年3月,在一起学习藏语的还有一个同学,就是黄布凡。等到5月的时候,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藏语专业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第一个藏语班就合并了。于道泉先生,还有雍和宫的一个喇嘛土登尼玛,还有一个叫洛桑曲珍的辅导员,三位老师带着我们两个学生,一共五个人,全部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

当时这个班一共招来了34个学生,其中女生有7位,所以叫“七仙女”,我是其中之一。这些学生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首先,是从十多个省的大学本科生里选送来的,一般都是中文系的学生,像王尧是大学二年级的,我也是大学二年级的;另外就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像胡坦就是高中毕业生。后来有4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到最后。当时别人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藏语专业第一班这30个人是“母鸡”,因为民院藏语专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出了很多小的。我们先在国子监待了几个月,然后搬到北长街的达赖驻京办事处,被安顿在一个四合院里。那里没有教室,我们就在当中一棵大核桃树底下上课,在核桃树上挂一块小黑板,老师在上面写,我们在底下记。在那个院子里头,大概待了七八个月,加上在国子监的一段,总共学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刚开始,我们学藏文的方法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于道泉先生讲究情景教学,他先不教字母,而是先教口语;没有教材,直接上口语。每次走进教室,于道泉先生都是口中念念有词:“laba, laba”(“手”的意思)、“guo, guo”(“头”的意思)……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被领进藏语世界的大门,由浅入深进入藏学殿堂的。

我们这个班的藏语教学主要是靠于道泉先生和格桑居冕。格桑居冕当时给于先生当助教,帮着编教材。那些教材现在都没有了,那是用拉丁符号标注藏语发音,用拉丁符号学到有一定基础后,就开始实践。因为于先生强调口语,他的教学理念是“口语领先”,所以规定每周有一天要说藏话,叫“藏语日”,从早到晚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汉语,说不出来就靠比划来表达意思。那种一个学生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发出各种陌生生僻的滑稽场景,如果被外人看到,还以为是一帮聋哑人在搞什么事呢!

口语大概学到四个来月,就开始学习藏文了。因为内容我们都会了,藏文老师告诉我们怎么发音以后,一看藏文马上会念,但还记不住单词,因为藏文有前加字、上加字,它不发音,但是正字必须要写它。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先知道它的内容,然后和藏文一对就能念得出来。这也是个奇迹了,可以说是语言教学上的一种飞跃。我觉得于先生在这点上,

思想非常先进。所以我们很快就掌握藏文了,大概学了两千左右的单词,然后我们就到贡嘎山实习去了。

老实说,短短一年多的学习,我们的口语还是不行。当时我们学习的是拉萨方言,但去西藏实习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只能到现在的康定。这时全班只有30个人,女生6个,男生24个。当地政府从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中抽调出四十名和我们在一起学习。于是,我们分为两个班,我们是一班,继续学拉萨话;他们是二班,学西康话。他们的教师是两个年轻的活佛,一个叫南卡诺布,一个叫卡梅梅·桑木丹,现在是国际上有名的藏传佛教学者了。我们的老师呢,也不是北京这班人马了,而是寺院里的贡嘎活佛亲自给我们教。教什么呢?教他认为最浅的,可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一本书,叫《佛赞》。《佛赞》是用藏文古典文写的赞颂佛的书,讲佛从小到大再到成佛的各种小故事,因为是用古文写的,不是口语,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难。而且贡嘎活佛用的是康方言,我们学的是拉萨话,卫藏方言,基本听不懂他说话。打个比方,卫藏方言相当于北京话,康方言像西南话,有挺大差距。这种情况下,我们学藏文太难了,因为口语的说法和书面语区别很大,到现在还有区别。好在格桑居冕是康巴人,他也会拉萨话,所以他有时候给我们做一些翻译工作。另外,格桑居冕和于道泉先生,当时还把胡坦抽出来了,几个人编了一套反映西康方言的拼音符号,教完以后马上转藏文,也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学,我们是学拉萨话的。

在格桑居冕老师的辅导下,我们30个学生组成了五六个人学习小组,对《佛赞》进行攻坚,一段一段地攻,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在一年左右的口语基础上,一本古藏文的《佛赞》居然被我们钻通了,真是不容易了。虽然学的时候很困难,但我后来搞敦煌古藏文,搞书面语的藏文,这本《佛赞》是很好的一个基础,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过程的确很辛苦,很累,



▲一九五一级藏语班女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大礼堂前合影(右二为作者罗秉芬)

难忘的老师 难忘的课堂

历史系1960级 徐亦亨:

我们入学时,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就已经有了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在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雄厚师资力量中,众多的正副教授们,同样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两个专业区分。

那时候,我们历史系众多知名正副教授们,与如今有些以“科研为主”自居的教授是不同的。在我们上学的那几年,历史系许多教授都是以教学为第一己任的,除了翁独健主任和林耀华副主任外,其他诸如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以及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程溯洛、陈永龄、邛平章等众多教授,都是亲自上台讲给我们上课的。

给我们上课的历史系知名教授们,都以各自渊博的知识和专长的学问,以他们多年钻研的学术心得,对我们进行殷切的教导和仔细的指引。他们对我们教育和指点,一直是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在各自几十年成长道路上,永不休止的前进动力。

特别是,当时我们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年讲师。他们都已登上教学第一线,风采万分地以丰富的学识,给我们传授知识,他们的讲课也深受我们的欢迎。兴许是因为年少稍近的缘故,这些中年老师平易近人的态度,更容易和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例如历史学方

面李文瑾、孙猷、苏晋仁、贾敬颜等老师,民族学方面施联朱、宋蜀华、黄淑娟、朱宁、王辅仁、吴恒、陈凤贤,以及傅乐焕先生的夫人陈雪白等老师,都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每次返校必然要去拜访的师长。

需要一提的是,因为历史系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具有两个方向:民族历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所以历史系的许多教授们,也同样有历史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的区分。比如在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中,在历史学方面的就有:张锡彤、徐宗元、王鍾翰、邛平章等教授;民族学方面的则有傅乐焕、石钟健、程溯洛、陈永龄等教授。此外,当时历史系还有一些担负着研究等任务,一直没给我们上课的知名教授,如:历史学的胡德煌教授,民族学的潘光旦、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教授等。

历史系1960级 何薄滢:

印象最深的是徐宗元教授。徐先生当时也就是四十开外,并不老,但他总是一副老先生的模样,经常穿一件蓝色中装,现在称汉服,与中山服不同。脚穿布鞋,冬天是夹棉的布棉鞋。还挂一柄文明棍。他学识渊博,口才也好,课讲得风趣幽默,把枯燥的先秦史,讲得像故事一样动听。往往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而忘记了记笔记。徐先生是在课堂上,也常和同学们开个小玩笑,来活跃课堂气氛。记得他上第一堂课,还搞了个点名。点到我

时,他一字一顿地叫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他说:叫了吧!你父亲是老学究吗?给你起这样的名字难为人。我笑了,的确,从小学到高中,新学点名时,老师总叫错。我说:叫了吧,不过我父亲是老学究。他又往下点,点到常明贤时,他叫成常明“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点到宋国强时,他说宋国不强……这些小花絮,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令人难忘。可惜他英年早逝,我们毕业没几年,这位优秀的老师就病故了。

历史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非常优秀。比如教蒙古史的贾敬颜先生,教藏族史的王辅仁先生等,贾、王二师都是北京人,都有特点。贾师刚届中年,已有些秃顶,抽烟斗,很像老学究。王师与贾师年龄相若,但看上去年轻得多,他有鼻烟壶,只吸鼻烟。我是第一次见识吸鼻烟的。二位老师口才也都好,课讲得很生动。再年轻一些的还有吴恒、朱宁伉俪,吴老师教彝族史,朱老师教东北民族志。李文瑾老师,教世界史,都十分敬业。李老师在讲课时,课又讲得好,人又开朗,平易近人,我十分羡慕和赞美她。陈老师在东北做过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她讲那温克族、鄂伦春族时,有十分生动的讲述,她讲“棒打狍子瓢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印象里。

但也很收效。出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我们没办法住到老家去,只能住在寺庙里。以前寺庙是不准女人进去的,可是我们这几个女生还是进去了,不进去我们没地方住。贡嘎活佛非常开明,知道为新中国培养一批藏族人才很不容易,他就破例让我们女生也进来了,给了一个小经堂让女同学住,一个大经堂给男同学住。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是打地铺,脚不能冲墙,为什么呢?因为墙上供奉佛像,壁画啊,所以头要冲墙,脚要冲外头,这都是寺庙里的规矩。

当时我们一群年轻人在庙里住着也憋不住,每星期六我们就自己组织舞会,有人会拉胡琴,有人用洗脸盆打拍子,全班同学跳舞。寺庙里头的年轻喇嘛也跑来坐着看我们玩,非常高兴。除了开会外,年轻学生没有锻炼身体的地方也不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半山上去开了一片地,建了一块只有一个篮筐的篮球场,还组织比赛。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从山顶上下到河沟里去洗头啊,洗衣服啊,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过年的时候我们组织节目,当地居民说的还不是藏话,是本话。当地的木雅人也有来历,他们信苯教,就是现在的苯教的前身,木雅是西藏文化起源的地方。木雅人的话我们也不会,怎么办呢?格桑居冕用我们那套符号把它记录下来给我们背,这样我们就能用木雅话演节目了。当时演了一个《兄妹开荒》,演了一个《夫妻识字》。我们还弄了一些幻灯片,宣传卫生常识啊,国内的繁荣景象啊,招来了周围许多群众,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那儿热闹极了。当时没有条件一家一户去住,只能住在庙里头,所以搞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当地群众接触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时的生活可以说很艰苦,但是非常愉快,非常丰富,也很有战斗气息,学习就像战斗一样。每天上课以后,组织小组攻关,不像现在这样只是坐着听。

我们在贡嘎山实习了四五个,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呢!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丹桂飘香中,我们迎来民大七十岁生日。七十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不忘初心来路;七十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牢记使命担当。你有民大,所以幸福充实;民大有你,所以生生不息。相互陪伴中,民大与你共同成长。生命中与民大交错的部分,成为我们共同的美丽记忆。

四号楼把东头阳面宿舍的“十二钗”

历史系1960级 何薄涛



我入学时共有十九个女生。四号楼把东头阳面的一间大房子,住十二位,都是外省来的。挨着它的一个小房间,住六位,都是北京录取来的。还有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同学石金莲,则在阴面一间,与外班女生混住。我就住在把东头那间大宿舍里,它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舒适,像家。我把住在这里的十二位称为“十二钗”,她们是:大姐张颖南,汉族,河南人,毕业于民院附中,老练沉稳,关心同学。二姐常明贤,蒙古族,毕业于承德高中,为人老实诚恳,人缘好。三姐阎锡杰,汉族,山东人,毕业于上海中学,不爱说话,会打乒乓球。四姐刘希敏,汉族,来自天津塘沽,为人豪爽,校篮球队队员。五姐郎淑芝,满族,来自辽宁盖县,端庄秀丽,性格温和,典型的东方女性,校话剧团成员。六姐马凤兰,汉族,来自辽宁北镇县,热情上进,校话剧团成员。七姐张淑云,汉族,来自

辽宁兴城县,要强能干。八姐郎焰美,汉族,来自四川,聪明倔强。我排老九,满族,家在沈阳,毕业于丹东一高。十妹孙玉清,汉族,来自四川,不爱说话,内向。十一妹李桂枝,汉族,来自辽宁黑山县,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她的答卷总是主次分明,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十二妹赵萍,汉族,来自天津,白净靓丽,性格温和恬静,很有涵养。我们十二姐妹一起愉快地生活了五年,没换过宿舍。朝夕相处,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五姐郎淑芝在四年级时因故休学一年,后来降到下一班,我也还认为她是我们班的,还是我们宿舍的姐妹。

如果说教室、图书馆是学习知识的殿堂,那宿舍就是养精蓄锐的充电器。我们姐妹十二人虽然民族不同,性格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虽然也会有小的争执,小的摩擦,但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我们宿舍的主旋律。

每逢周日,大家常围坐在宿舍正中的大桌子旁,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嬉笑打闹,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五姐郎淑芝总爱唱东北民歌《小拜年》《丢戒指》。我和六姐马凤兰则爱唱苏联歌曲《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列宁山》《母亲》等。自己唱,也相互教唱。兴致来了,还唱儿时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六月花儿香》《快乐的节日》等。大家还常常唱《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等。有时也讲故事,评论刚看过的小说,吃西红柿,吃暖瓶面。脾气相投的人,还常常互吐心声。

(图文由民族博物馆口述史研究中心提供)



▲ 1981年,乌云格日勒与诺尔吉玛在宿舍学习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在当年,参加高考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拼搏一下,可能是改变命运的英明之举。然而当时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错过了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机会已有几年或十几年,有的早已结婚生子,有的下乡或回乡务农,有更多的人从事着不同行业的工作。据资料显示,当年570万考生大军一下子涌进了考场,而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29:1,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我生长在内蒙古大草原,从小受蒙汉双语教育。我们蒙古语小学从3年级开始加汉语课程。记得当时我不仅在课堂上好好听讲,按时完成作业,还特别注意蒙汉语的发音,经常听蒙语和汉语广播学舌,即使是学习蒙汉文“老三篇”也做到双语倒背如流。当年,有几位同学随父母转到其他旗县,另有几位同学转到汉语学校,初中毕业时,蒙古语班只剩我们六个人了。家父家母一直教导我努力学习,老师也没有因为学生人数减少而放弃严格要求。正是由于老师、家长和我自己的坚持,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机会。1972年6月份初中毕业时赶上阿鲁科尔沁旗天山蒙古语高中改建,那一年不招生。为了就近上学并且照顾弟弟妹妹,我上了天山一中。我被分配到高一·六班,由于是第十个报到的,故我的学号为10号。可能是这个学号叫起来顺口吧,每科老师在课堂上提问都最先叫我这个号。也好,这能使我上课不溜号,又锻炼了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以及我自己的努力下,我的各科成绩都名列中等。

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真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是那次高考的直接受益者。当时我在昭乌达广播电台(现赤峰市)蒙编部工作。我让家里寄来了保存了几年的高中课本,并向单位请了一周假,开始复习。因为刚刚恢复高考制度,什么辅导材料也弄不到,好不容易淘到几页高考大纲,白天看书学习,晚上借助办公室的电

我与民大的缘份

■ 乌云格日勒

灯光和安静的环境复习到深夜。在我备考期间,蒙编部的领导和同事们为我提供了复习功课的条件,汉编部的几位编辑老师指点迷津,义务为我进行语文知识辅导,令我非常感动。当时昭乌达盟属于辽宁省管辖,我读的又是汉文高中,所以毅然决定参加辽宁省文科考试。参加考试那几天正赶上赤峰市下大雪,我带上从蒙编部一位同事那儿借来的军用棉手套,骑着从单位食堂师傅那儿借来的自行车赶到在赤峰市第十中学设置的考场。报考的人可真不少,可谓考场外大雪纷飞,考场内热血沸腾。好在已经拥有了既能工作又能学习的记者工作,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发挥得还算正常。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蒙语班,所以又参加了蒙古文加试考试。1978年初春,我喜出望外地接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2月25号的晚上,我和考到同班从巴林左旗赶来的包格日勒一起乘上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26日早晨六点多到达北京站,坐上学校接新生的车到校报到。我们被安排在12号楼,七人一个房间。第二天我和几位同学穿上民族服装,去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当时都是黑白照片,3寸见方的那种。在那个年代,有私人照相机的并不多见,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排队等候拍照的人还真不少。摄影师傅照顾我们是少数民族,优先给我们拍了照。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首都北京,所以每到星期天就去公园游玩,当年就去过故宫、景山、北海、动物园、紫竹院、颐和园、天坛、八达岭长城等景区。记得开学后进行了一次汉语作文考试,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考了前四名,受到老师表扬。我们班有35人,最小的18岁,最大的28岁。记得我们班同学不但学习成绩优秀,在学校组织的军训、学农、卫生、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方面也都是名列前茅。我们班曾获中央民族学院先进集体、先进团支部、文艺汇演先进集体、篮球赛冠军、卫生先进集体等奖项。不仅如此,在校期间我们77级蒙语班还为修整学校操场和民院社区植树挥洒过辛勤汗水,是民大校园及其周边环境观的直接参与者,是民大校园面貌焕新颜的见证者。我们班有提前毕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有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北京市三好学生的,还有8人获院级三好学生称号。在校期间,我曾担任民语系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班委会生活委员,在“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毕业考试中与另一位同学并列第一名(98分),并且《浅析蒙语后置词问题》被评为优秀

毕业论文。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5月17日,我们77级蒙语班发起组织了“北京蒙古族那达慕”大会。这项展示民族特色、增进民族团结、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盛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十届。四十年来,我们77级蒙语班一直是中央民族大学引以为荣的楷模。后来我们班同学中有多人获博士学位并担任博士生导师。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同学们在各个工作岗位都是领军人物和业务骨干。据统计,其中有六人被评为二级教授、二级编审和二级研究员;一人荣获“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一人获“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二十余人被评为教授、编审、译审、研究员;两人担任司局级领导干部;十人担任处级职务。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民族语文学翻译局蒙文室工作。期间参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79-2009)等200多本书的翻译、审稿工作。1982年起参加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协商会议、全国党代会文件的笔译及大会同声传译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编著出版《应急学语言·蒙语》《蓝色星光谱——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蒙文室翻译工作纪实》等书;翻译出版《农产品收购、买卖》等20多本书。撰写《元代的翻译制度浅析》等翻译学论文二十余篇,发表于《语言与翻译》《翻译与文化》《民族翻译》等杂志。其中《新名词术语翻译浅析》(法律文献翻译中的准确理解与表达)《蒙古语口语中的汉语借词现象及术语规范》《试论国际会议蒙古语同声传译》等四篇论文获翻译学论文文、一、二、三等奖。应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外文局、国家民委、国家委和多家翻译公司邀请,承担外事会议、出国考察、会晤、谈判、庭审、交流活动等蒙汉双向翻译八百多次。2005年9月以来承担“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蒙博览会”等大型国际会议现场同声传译二十余次。曾获“民族语文学翻译资深工作者”奖励。

2007年3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和奖章。国家民委系统唯一获得此殊荣的我真是激动万分!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更主要的是对民族语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认可和好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翻译工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为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作者单位: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

我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结缘

——牟锺鉴先生访谈录



我和中央民族学院挺有缘分的。我1957年来北京,在北大读书8年,本科5年,研究生3年,学中国哲学。像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博崑,都是我的老师。我记得不错的话,1963年前后,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先生有一个批示,说他是“凤毛麟角”,就是说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主席的批示是要重视宗教研究。这样,就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正巧我应届毕业,自然就分到那里,就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自己找工作,就在家等统一分配,等了半年。1966年4月份分到宗教研究所。当时,现在的社科院叫哲学社会科学部,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宗教所设在学部里面。

1975年,当初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过的一个老师叫吕大吉,他从中央民族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我们就成了同事,成了朋友。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宗教学在中国的兴起。之所以说是“兴起”,我认为毛泽东主席给任继愈先生的批示是一个种子。宗教研究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说得再远一点,宗教学在西方兴起140年。在中国,原来没有,理论方面没有,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那么,1963年毛泽东作批示,这是个种子。可是一搞“文化大革命”,又没法研究。正式研究开始于1979年,当年在昆明召开了一个全国宗教学研究对话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宗教学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吕大吉就有一个想法。他当时虽然调离了学校,但对这所学校始终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他觉得中央民族学院应该发展宗教学这么个学科,因为研究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不应该忽视宗教。他和当时学校的领导很熟,特别是跟院长和教务长孙若穷非常熟,所以他跟学校建议到外面调几个人来,一起来建设学校的宗教学学科。校领导表示同意,于是他就很热心地从中穿针引线。我当时有一个具体的情况,我夫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刺激,精神分裂,住院治疗好好坏坏,前后一共18年。我原来住在前门东大街,比较吵。吕大吉说民族学院这两头都不挨大马路,比较安静。就这样,一个外因一个内因就促成了我的调动。

1987年春天,佟德富老师和班班多杰老

师到我前门东大街的家里去,和我恳谈,表示正式的邀请。我说好,我愿意和学生接触。因为社科院也带研究生,但是教育部给的名额很有限,学校里学生多,所以我说我愿意到学校里去。这样,1987年7月份就很顺利地调过来了。很顺利是因为宗教所和我关系也非常好,不反对,不阻拦,而且还让我带一套房子过来。来了以后,1988年初,我搬到家属院,学校安排我搬进了黄淑婷老师调走后留下的那套“三大间”,那是当时被认为最好的房子。

来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些朋友反对,说民族学院的民族学、人类学都是顶呱呱的,但是哲学、宗教学不行。社科院是一个中心地带,你跑到那儿干什么?我说不后悔,我自己做决定,我觉得挺好。特别是来了以后,我感觉咱们学校一个多民族,老师是多民族,同学是多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觉得几十年民族关系没有任何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相处非常好。再一个呢,有学生,你正经当了老师,不像在社科院以研究为主,偶尔带个学生,这个是面向本科生,研究生,我认为天下最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很难得,因为有一个师生之情,别的职业享受不到。本科生是上大课,后来带研究生,当时只有硕士生,我带了11个。后来有博士点,带了29个博士。这是我最大的精神财富。

我和学生们关系很好,好多甚至结下一生的友谊。尽管他们都毕业了,但经常回来找我,保持信息沟通。他们在岗位上工作做得挺好,大部分表现都非常好;也都很赞扬学校,觉得民族大学教育很有质量,反映真的都很不错。本科生考到人大、北大、清华大学,去读硕士、博士,所有的学校反映都说民族大学的本科生很好,这是普遍性的评价。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我挺自豪的。这不是个人做了多少,那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你培养的学生怎么样,这是关键。所以我特别感觉到愉快,而且在这个地方,二十几年,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而且,从哲学系来看,一直比较和谐。

我1987年底来学校,1988年哲学系成立宗教学研究所。当时吕大吉是名誉所长,佟德富是所长。佟老师这个人,心胸非常开阔。引进人才,培养学生,建设团队,各方面都让我感到舒心 and 敬佩。我觉得来了以后,最值得回忆的就两件事:一个就是带了一批学生,看到他们成长;再一个就是和我们系的老师一起,接受社会科学学院的资源,建立宗教学。

(图文由民族博物馆口述史研究中心提供)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求知治学经历

——班班多杰教授访谈录



我的家乡在青海宗喀地区,就是现在的西宁市湟中县塔尔寺地方。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文革开始不久,我就上了青海民族学院附中。青海民院以前是大学,1964年因为要培养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积极分子,就把大学撤了,办了一个翻译班和一个师训班,专门为牧民培养翻译人才和中小学老师。我是师训班班长,初中毕业后学了两年,1971年中专毕业,正赶上中央民族学院在全国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的青海民族学院正想恢复大学,十分缺少教员,想自己培养一批教员,就从我们这批毕业生里选了几个所谓成绩好一点的学生,直接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来学习。我1971年11月来,1974年9月毕业时学校没让走,我就这样留在了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教研室当教员。当时吕大吉教授、佟德富教授都是我们一个教研室的。

我是藏族,从小学习藏语藏文,因为那时实行双语教学。开始留校时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文革结束后,大家都向科学进军,都想搞自己的专业。当时我也不甘落后,也准备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所作为。这时候,佟德富、余康康以及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就提醒我:“班班,你应该研究藏传佛教哲学。你的专业是藏传佛教,你的哲学基础非常好,既懂汉文又懂藏文,你以后要是搞藏传佛教哲学的话,那要比别人强得多。你要搞别的哲学,估计你赶不上人家;但搞藏传佛教哲学,对你来讲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他们这么一提醒,我觉得太有道理了。于是我一边教哲学课,一边去民语系藏文教研室跟着当时的研究生班听藏文课,为研究藏传佛教打基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学校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于1961、1962年办了两届古藏文研究班,因为需要高水平师资,就从西藏请来了好几位专家和学者,东噶活佛就是其中之一。他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学习,思想非常敏锐。到了北京以后,他又学习了汉语文;同时,还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实际上就是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还提出了现代教学方法。因为在大学里面教学和在寺庙里面教学毕竟不一

样。所以,到北京以后,他学问增进很快。一方面他在传统方面基础非常好,传统的藏文化非常深厚;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理论,现代的教学方法,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体现得明显。

改革开放一开始,东噶又回学校,1978年开始上课。那个时候我们招了研究生,招了古藏语研究班,他一来了就投入到教学里面,给研究生、古藏语进修班学院以及老师们上课。我跟着研究生班随堂听课,他的藏传佛教史课我一共听了三遍。这门课用的教材是《土观宗派源流》,原文是藏文,后来刘立千教授把它翻译成了汉文并加了注释。我每次听课都做很详细的记录,最后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认真消化、认真吸收,还结合这个教材认真学习。在东噶先生授课和教材的基础上,我又搜集了很多和藏传佛教思想史相关的重要的藏文资料,花了近十年的功夫才写出了《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算我早期的一个代表作。任继愈先生写了序,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我研究藏传佛教的一个基础。

1978年初,当时西北民院的文志老师把我推荐给白塔寺的法尊法师,这样我又跟佛协的法尊法师学习。他在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史以及将藏传佛教的经典翻译成汉文方面,在国内可以说是第一人。是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翻译的大家。法尊法师圆寂之后,我又跟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学习。观空法师和法尊法师是同学,一起进藏,一起去学习藏传佛教,他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中国佛学院的教师。郭元兴居士藏文也非常好,是赵朴老的秘书。跟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学习,使我对于藏传佛教史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1981年前后,我又通过我们系樊先胜老师的热情引荐,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先生,于是又跟方先生学习怎么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写的第一本书,他认真批阅修改,并在《中国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评价以推介。没有这些大师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宝贵指导,肯定没有我的今天。

在我求学治学过程中,还需要提及的一点,就是牟锺鉴先生前辈对我的影响。他调到系以后,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还有吕大吉教授,七十年代初我入校当学员的时候,吕老师给我上过课。从1998年开始,吕老师、牟老师,还有我们好几位组成了一个爬山队,一周组织一次爬香山,时不时地还加入一些大学者,如于东来、戴康生、葛荣贵等先生。爬山既是锻炼身体,又是学习的绝佳机会。因为吕大吉、牟锺鉴等先生不光爬山,一路上他们几乎不停地热烈地、无拘无束地谈学问、讨论学术问题,我们跟

在身边当听众,偶尔也插话,请教问题。这个机会在课堂里是得不到的。我们整整坚持了12年。这十几年的爬山对我来说受益太大了。

我在写了第二本书《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之后,就比较系统地投入到了藏传佛教的教学和研究中,并开始进入了藏传佛教专题研究,因为通过写这两本书,对藏传佛教各个哲学流派的思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怎么样进行专题研究,使这个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我采取各个击破的打法,专题研究藏传佛教史上的每一个宗派。首先研究的是萨迦派。为此,我到过高僧,到过萨迦寺,专门请教萨迦派的,到过西德,也接触了论述萨迦派有关哲学思想的藏文经典,写出的一些专题文章,我还请方立天教授指导过。方教授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接着,我研究宁玛派,关于宁玛派大圆满法专题思想的研究成果,也在《哲学研究》发表了。后来又转向了觉囊派的研究,其中对这一派的经典《山法了义海论》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藏学》连载,已发表12篇,最后一篇正在写;还有一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觉囊派的研究算一段落。

目前,我正在研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思想。关于格鲁派的思想,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其他杂志也发表了多篇。其中关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思想,我写了一本《宗喀巴佛教思想评传》,估计有40万字,准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交稿。现在关于噶举派的思想还正在撰写,随后将陆续公之于世。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我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与藏传佛教思想史论》,现正组织编写。我们有一支十几个人的团队,主体是我们学校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和藏学研究院的师生,还有北大、青海民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关于资料选编,有三个方面的资料:第一是我自己翻译积累的资料。我研究藏传佛教将近40年,期间翻译的一部分资料我在写文章时用到了,但很多资料还在“睡觉”。另外,近代以来,像法尊法师、观空法师等高僧大德也写了很多藏传佛教的藏文资料翻译成汉语,这是第二个资料。第三个资料,是组织再翻译一批。目标是做一个三四百万字的藏传佛教资料,按照藏传佛教年代顺序和发展脉络编出来。这是课题的第一项任务。第二个,就是把这个资料为基础,写出一篇藏传佛教思想史论、前史后论。这样就完整、就珠联璧合了。一个是资料,一个是史论,我们力争把它做成了我们学校科研成果的一个品牌。(本文根据2016年11月10日张龙翔老师对班班多杰教授的访谈资料整理,民族博物馆口述史研究中心提供)